

「君」臣同心： 慈禧太后賞「御」書的政治意涵

陳玉秀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慈禧太后（1835-1908）掌權的清同治、光緒四十八年之間，留下不少書寫大字的活動紀錄及書法作品。習書法是她成就皇家大業的一種政治技巧；「御」書年終賞賜及祝壽臣工，也是她謹守祖宗家法，萬年法守的從政手段。她透過賞賜臣工書法大字的舉動，以攏絡天下臣民；臣工在謝恩賞摺中承諾對她的忠誠，提醒自己與其同心治理國事，戮力處理朝廷或轄區內的政務。受賞臣工視其書法大字如天賜的祥瑞，是預告能為他們排除困難及國事安康的先兆。慈禧太后「御」書大字是「君」臣溝通的媒介，為她的政治權謀留下見證。

關鍵詞：慈禧太后、御書、賞福字、祥瑞、同心

一、前言

過去學界對慈禧太后（圖1）書法作品的詮釋，常納入後宮「娛樂生活」¹或認為她在生活品質上要求精緻，所以寫字作畫是其「後宮精緻生活」²的日常情趣。對她的書法作品的探討則著重在親筆，抑或代筆的風格議題討論。³ 耙梳清同光兩朝《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紀錄，慈禧太后、清同治皇帝載淳（1856-1874；1861-1874 在位）及光緒皇帝載湉（1871-1908；1874-1908 在位）三人在四十八年期間，旨造辦處裝裱及刻匾等御書大字逾千條，數量達一萬件左右。⁴ 他們的書法類型多重複，有龍（圖2）、虎（圖3）、福（圖5）、祿、壽（圖6）、喜（圖4）、佛、平、安等字，品類不多。其中又以福、壽兩種大字最常見，除了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西狩時不見紀錄，四十七年之間未間斷。

慈禧太后下令造辦處成做的書法作品，也涵蓋各類字對、橫披及匾額，例如「富貴長春」、「出門見喜」、「受福」、「宜年」、「清平」、「如意」、「福祿壽喜」、「天官賜福」、「竹影松風」、「安瀾同慶」、「萬福脩同」、「迎享」、「延年益壽」、「輝光以新」、「體和道全以享億年」、「黍谷回春」、「克施萬物」、「視坦一方」、「歲歲平安」、「膺受多福」、「大吉」、「無逸」、「福壽久長」等吉祥話。字對則有「宴啟蟠桃瓊萼金柯千歲果，輝分若木銀罌翠釜九華燈」、⁵「和緩天機瓊紫玉，桐雷神術秘青囊」、⁶「秀毓璇源擬燕喜，思延青瑣荷龍光」、⁷「楮鞭百草神農法，神經自昔傳中藏；寶籙千金思遯方，聖水當年飲上池」、⁸「素問書存三古後，周官效奏十全中」⁹等，一式吉祥語彙。

1 嚴瑞源編，《慈禧太后——生活藝術（Empress Dowager Cixi: Her Art of Living）》（香港：海光印刷有限公司，1996），頁78-79、92-93。

2 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71-72、110-111。

3 杜恆偉，〈競誇天下無雙絕，獨立人間第一香：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賞析〉，《收藏家》，2016年3期，頁51-57。

4 此統計為筆者耙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同治、光緒兩朝《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複製本）共47年（其中清光緒二十六年從缺）的結果。

5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七年八月初十日〈金玉作、銅鑲作、油木作呈稿〉。

6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八年四月初四日〈金玉作、銅鑲作、油木作、匣裱作呈稿〉。

7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八年四月初三日〈油木作、金玉作、銅鑲作、匣裱作呈稿〉。

8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八年四月初四日〈油木作、金玉作、銅鑲作、匣裱作呈稿〉。

9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八年四月初四日〈油木作、金玉作、銅鑲作、匣裱作

據紀錄觀察，慈禧太后掌權的四十八年間，無論是署名她親筆，抑或清同光兩位皇帝的御筆大字，移交內務府造辦處托裱、作為妝點內廷的貼落或作為祝壽、犒賞百官及民間等成做的命令不斷。就賞賜的案例而言，慈禧太后在光緒十一年（1885）十月三日「老佛爺御筆福字二張，福祿壽喜各一張。」¹⁰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六日「皇太后御筆匾二面、抱月字對一副、平面字對一副；皇上御筆匾一面，抱月字對一副。賞恭親王朗潤。」¹¹有趣的是，觀察檔案紀錄，從清同治元年（1862）起，西北兩路將軍、大臣及西域天山南路的官僚伯克，幾乎每年規律性的收到御書福、壽字的賞賜（參考附錄一）。即使在慈禧太后還政的清同治十二年（1873）至十三年（1874）及清光緒十五年（1889）至二十四年（1898），她宣佈重新訓政之前，每年的十一月左右，其「御」書幾乎都是由懋勤殿太監提出，並由軍機處發下賞賜，是一種常規的制度。

皇室不僅對外任臣工賞御筆福字，在每年十二月立春也賞內閣大臣。清同光兩位皇帝的經筵帝師翁同龢（1830-1904）在日記中記錄同光時期宮中賞內閣大臣福字的宮中俗。清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立春，南齋樞機處為年幼的皇帝準備春帖子賞大臣。「春帖子，俗稱為跪春」，因受賞的「樞廷、御前、內務府皆在殿門外磕頭」之故。賞春帖子之外，群臣也受賞筆及絹等，「即所謂春帖紙也」。¹²當日翁氏也受「賞福字一張」由「南齋恭代筆」。¹³當時清同治皇帝載淳年僅十歲，以南書房代筆福字賞翁同龢，實情有可原。一直到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六日，帝滿十三歲才「親書福方，故用舊例，非樞廷軍機，內府不得加壽字。」¹⁴

清光緒二十年（1894）十二月立春，時直甲午戰爭期間，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依舊賞臣工荷包、龍、福、壽字等年禮，此時賞臣工「飲屠蘇」酒也是宮

呈稿》。

10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油木作、金玉作、銅鑲作、匣裱作呈稿〉。

11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油木作、銅鑲作呈稿〉。

12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收入趙中孚編輯，《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研究資料叢書》（臺北：中文研究資料中心，1970），冊1，「同治（乙丑）四年十二月（一八六六、二）」十八、十九日，頁310-311。

13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1，「同治（乙丑）四年十二月（一八六六、二）」十六日，頁310。

14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2，「同治（辛未）十年十二月（一八七二、一）」十六日，頁633。

中習俗。¹⁵除了光緒皇帝賞福字，這年慈禧太后也賞〈御筆福壽字〉(圖7)，¹⁶並賞大小荷包及銀鏢、龍、福大字。¹⁷年終亦賞紅色荷包。賞賜的習慣上，皇帝「宣諸臣近前，依次手賜八寶荷包一，內侍奉福字一方面授之，一跪三叩。」賀新年喜，「諭以風雨調順，今年當勝去年」。¹⁸但也有年終「奉上諭，恭親王福字撤下，毋庸賞給」¹⁹的案例。恭親王奕訢(1833-1898)指揮內廷軍機處，在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期間指揮失據，和戰不定，最後軍隊敗退。慈禧太后以恭親王委靡因循為藉口，罷黜其一切職務，但仍允許他遊走於軍機樞要之間。一直到甲午戰爭敗北之後，恭親王奕訢才再度被起用，但已無法起建設性的政治效應。撤賞的案例發生在光緒十八年(1892)，此時恭親王仍在被整肅期間，不得受賞。由此案例判斷，清皇室對年終賞樞要御書福字的嚴謹態度，並非所有的臣工皆可得，受賞是一種榮譽，是受寵與否的帝王裁斷。

慈禧太后掌權期間，年終皇室賞內閣及外任臣工書法福字的規矩，是刻意而為的舉動。此舉的意義對皇室，或更詳細的說，對慈禧太后的目的何在？關於此議題學界著墨不多。職是之故，本文擬整合清同光年間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軍機處檔奏摺》、《翁同龢日記》及劉坤一(1830-1902)、左宗棠(1812-1885)、李鴻章(1823-1901)等受賞臣工的謝恩賞摺，試圖瞭解慈禧太后書寫及賞臣工「御」書大字背後的目的。藉此評估慈禧太后「御」書大字在「君」臣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二、慈禧太后「御」書是承繼「萬年法守」的家規

從藝術史的角度，學界對慈禧太后的書法成就，雖未全盤否認，然運筆流暢有力大概就是最高的評價。²⁰然而，清光緒年間舉人徐珂(1869-1928)曾生動描

15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光緒(甲午)二十年十二月(一八九五、一)」廿九日，頁1933。

16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3，「光緒(癸未)九年十二月」廿三日，頁1263；《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2，「同治(庚午)九年十二月(一八七一、一)」十二日，頁580。

17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3，「光緒(甲申)十年正月(一八八四、二)」朔，頁1265。

18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5，「光緒(丁酉)二十三年正月(一八九七、二)」元日，頁2069；《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3，光緒(甲申)十年正月(一八八四、二)」朔，頁1265。

19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光緒(壬辰)十八年十二月(一八九三、一)」廿八日，頁1798。

20 劉曉晨，〈「聽政之暇」丹青癖——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藝術品》(2016.7)，頁

繪慈禧太后書寫大字的景象：

孝欽後喜作擘窠大字，亦臨摹法帖，作小楷。尤喜繪古松，筆頗蒼老，每畫一幅，輒為近侍乞取。李文忠公鴻章七旬賜壽，所賜畫松，亦親筆也，是為生平最得意者。孝欽每作書畫賜羣臣，一落筆，輒曰壞了壞了，眾太監必交口稱頌，後〔后〕喜，始成篇幅，否則手碎之矣。孝欽喜作大字，用丈餘庫臘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均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為匾額。²¹

徐珂的紀錄提到慈禧太后畫古松賞李鴻章七旬大壽一事，亦即他記錄的內容是光緒十九年（1893）之後的場景。徐氏記錄慈禧太后書寫的契機，除表現她日常喜好，可分專為宮中裝潢及賞賜臣工兩個面向來觀察。場景是描繪慈禧太后政事之餘，在眾臣及太監圍觀之下，她的即席「墨戲」，並與群臣分享翰墨的雅事。除了賞賜，慈禧太后書寫數量之多，或令刻成匾額懸掛宮中各殿閣。就學界對慈禧太后書畫成就的評論推測，徐珂記錄的「觀書會」應該不是以評鑑她的作品優劣為目的，而是以凝聚眾多臣工圍觀，乞求她的賞賜是整個會場的重點。Katharine Augusta Carl (1865-1938) 在 *With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一回憶錄中記錄類似的場景。Carl 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五日入宮，於慈禧太后身邊為其畫肖像為期九個月之久。她回憶，慈禧太后尤其喜歡在大幅紙張上書寫單個大字，臣工受賞「御」書則是最大的榮耀。一天，Carl 受邀前往觀看寫書會，她並以鉛筆速寫這次被臣工、皇后、公主及太監等臣下所圍繞的書寫場景（圖 8）。²² Carl 畫中的後景懸樑上，「正大光明」匾額高高掛。明顯交代這場盛會是在內廷乾清宮舉行。乾清宮為內廷地位最高的殿閣，清乾隆皇帝以來作為問政之所，也是慈禧太后垂廉聽政、接待外國使節及舉辦國家重要慶典的專用場所。而慈禧太后雖為太后，但能在朝廷最重要的政治場所主持書寫大字的盛典，應可推測，她以一國之「君」的身分在「演出」這場盛會。

據檔案及回憶錄的紀錄，慈禧太后為書寫者及賞賜者；臣工為觀書者及受賞者。此時，她的書法作品是媒介，透過觀及賞的動作，聯結了慈禧太后與臣工雙

11-13。

21 (清)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冊 8，稗 71〈孝欽后善書畫〉條，頁 11-12。

22 Katharine Augusta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London: KPI Ltd., 1986), 135-136.

方。但慈禧太后又為何要以書法為雙方聯結的媒介？她的企圖何在？討論此議題，需將歷史脈絡還原到清聖祖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1-1722 在位）時期來觀察。清康熙《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曾訓示子孫帝王之道，他認為：「書法為六藝之一，而遊藝為聖學之成功，以其為心體所寓也。」²³ 習書法是成就皇室大業的一種基本。且強調「字乃天地間之至寶，大而傳古聖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難記之瑣事。能使天下士隔千里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²⁴ 康熙皇帝勤於書寫的原因是為了賞賜臣工，所到之處也試圖留下御書的痕跡。他更強調，御書賞賜是「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者贈卿，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²⁵ Jonathan Hay 認為，康熙皇帝御筆書法的傳世不少，但對他而言，習書法並非為了成為傳統文人世界中的書法家。而是，他利用賞御書為手段，令漢族文人官僚體制下的臣工對外族滿人皇室的認同。康熙皇帝御書的內容多為施政理念或激勵人心等詞句，臣民閱之，能瞭解皇帝的施政思惟。臣民見御書，猶如親見皇帝。透過漢族文人臣工及各地地方百姓視皇帝如天子，其御書總被帶有宗教性瞻仰的頂禮膜拜，致使康熙皇帝能鞏固滿族皇室中央集權，各方聽命的目的。賞御書提高康熙皇帝於各階層「曝光」的機會，是一種類似現代媒體報導關於康熙皇帝事跡的傳播。代表皇帝的御書的傳播，也突破早期，皇帝之於大部分臣工及地方深不可測的君臣關係。²⁶ 陳佳也認為，在清代官僚體制中，由於文化傳統的作用，帝王的宸翰之賜，比其他賞賜更被臣工所珍視。清帝王的書法是連接臣工與帝王互動的媒介。臣工受賞御書，倍感恩寵與榮耀，藉御書之力足以激勵臣工忠君，為君效勞的效果。清代帝王賜書的獎勵形式，滲透在清代的職官制度中，有助於帝王對臣工的管理。²⁷ 侯皓之進一步分析清乾隆皇帝御製詩等史料，並指出，清皇室賞臣工御書「福」字的習慣，已於清雍

23 (清)清世宗述，劉承幹校，《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冊 60，頁 63。

24 (清)清世宗述，劉承幹校，《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60，頁 52。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冊 8，〈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甲申〉，頁 3972。

26 Jonathan Hay,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 Hung Wu et 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1-333. Jonathan Hay 一文中認為，當十七世紀西方世界以帝王的肖像畫及報紙傳播帝王形象及政策的同時，清皇室則利用文人書法傳達中央集權的帝王訊息。

27 陳佳，〈清代朝廷書法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頁 60。

正朝成為慣例。²⁸ 清乾隆《御製詩餘集》，卷八，〈嘉平月朔開筆疊辛亥詩韻〉明云：「開筆嘉平肇吉朔，敬遵家規萬年垂。以雲歸政當付子，尚覺身強可應。」詩旁並註：

每歲嘉平月朔開筆書福賜王公內外大臣等，此皇考時成例。予六十餘年來每歲敬遵，我子孫所當萬年法守也。以歸政而論，書福錫賚臣工今年當為子皇帝之事，然予仰蒙天眷，精神康健如常，即如今早謁闈福寺拈香寺後，佛樓三層仍依舊登陟，何敢不自強以承昊貺。是以訓政勅幾孜孜猶昔，俾子皇帝諸事益得練習，豈非予與子皇帝下及天下臣民大同之福耶。²⁹

清乾隆皇帝明示子孫要「萬年法守」的這條皇帝年終賞御書予臣工的制度，使之成為君臣之間共同家規。侯氏並指出，清帝王賞賜福字予臣工是一種政治手段。藉由賞御書福字及臣工書寫恩賞摺回報的模式，形成君臣之間對話的賞御書傳統。賞御書福字原以褒獎立功、勉勵廉潔、警惕諸臣、籠絡庶士或錫福蒼生，均是為統御臣民的手段或治理國家的期盼而寫。³⁰

既然，年終御書賞賜是皇帝的職責，而慈禧太后掌政時期的檔案中，她的「御」書賞賜紀錄數量龐大。在此意味，慈禧太后雖以太后的身分垂廉聽政，實際是行皇權職責。然而，慈禧太后非皇帝，她的書法能如歷朝的祖宗，據有政治謀略？

三、慈禧太后「御」書的「君」權表現

觀察傳世慈禧太后大字書法作品，不論代筆與否，大字的正上方尋常鈐一方「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朱泥楷書方印（圖 9、10）。清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宣宗皇帝駕崩，改明年為「同治」元年（1862）。慈禧太后在咸豐皇帝奕訢（1831-1861；1850-1861 在位）駕崩的第二十九個月後，即清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七日懿旨傳造辦處如意館刻印十方：

28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史學彙刊》，25 期（2010.6），頁 118-119。

29（清）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收入《御製詩餘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冊 10，卷 84，〈嘉平月朔之作〉，頁 28。

30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史學彙刊》，25 期（2010.6），頁 105-160。

「慈禧皇太后之寶」二方（陽文一、陰文一）、³¹「慈禧皇太后之寶」一方（陽文）、「海涵春育」（陰文）、「平安室」一方（陽文）、「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一方（陽文）、「大雅齋」二方（陰文一、陽文一）、「激心正性」一方（陽文）、「大順齋」一方（陽文）。³²

傳世品中，定為慈禧太后墨寶的作品上方常出現這幾方鈐印。例如清光緒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朱書〈御筆福祿壽字軸〉（圖7）³³及光緒二十八年（1902）畫〈牡丹圖軸〉（圖11），³⁴在兩張作品的正上方均鈐「慈禧皇太后之寶」篆書方印各一枚；另，〈牡丹圖軸〉則在慈禧太后落款的正下方鈐「激心正性」橢圓印。再觀察瀋陽及北京故宮收藏慈禧太后的書法作品，書法字的正上方均鈐「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³⁵「御筆」為帝王親筆，慈禧太后令刻此印的企圖，且此印章多鈐在大字書法作品上，而這些作品多用於賞賜內閣、外任大臣及王親貴族，是承繼康熙朝以來帝王賞御書予臣工的傳統。在此也不難推測她在政治上以「君」王自居的野心。

慈禧太后為「君」的角色，也表現在清同光時期的奏摺文書體制中。清咸豐皇帝駕崩之後，肅順（1816-1861）等大臣主張用臣權輔佐幼帝管理朝政。然而，當時正統皇權的思維聲浪強大，即使是肅順等權臣信任的漢族官僚李鴻章、曾國藩（1811-1872）等人，也主張應由正統皇權輔佐幼帝。因此，代表正統皇權的慈禧及慈安（1837-1881）兩宮太后即正式垂簾聽政，開始了慈禧太后四十八年的政治操控。³⁶

清康熙時期創立奏摺制度，使君臣之間能藉此密奏直接溝通。在奏摺文書體制上，唯君王有批閱奏摺的權力。閱讀清雍、乾時期硃批奏摺，³⁷軍機處副錄的奏摺尾端，以奏明伏乞「皇上睿鑑」或恭謝「天恩」（圖12）等字錄之，且皆以擡寫的體制出現，以示皇權裁示不可違命。

31 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52、163。

32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如意館〉。

33 嚴瑞源，《慈禧太后——生活藝術（Empress Dowager Cixi: Her Art of Living）》，頁92。

34 嚴瑞源，《慈禧太后——生活藝術（Empress Dowager Cixi: Her Art of Living）》，頁93。

35 劉曉晨，〈“聽政之暇”丹青癖——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藝術品》（2016.7），頁13；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110。

36 王開璽，〈辛酉政變與正統皇權思想——慈禧政變成功原因再探討〉，《清史研究》，4期（2002.11），頁49-56。

37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複製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輯12，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奏謝恩賜哈密瓜摺〉，頁824。

觀察清同光年間的奏摺體制，咸豐十一年（1861）下半年至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的奏摺，文書體制維持咸豐時期「伏乞皇上聖鑒」（圖 13）的習慣，表示皇帝是奏摺內容的最高裁決者。³⁸ 最晚在清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為奏摺裁決者的體制才完備。此時，奏摺的尾端，伏乞「皇太后」與「皇上」並列共同聖鑒，即為例證（圖 14）。³⁹ 就此觀察，慈禧太后從懿貴妃直至實際掌權歷經了十八個月的時間。其間，在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即咸豐皇帝駕崩的後一天，慈禧太后因子之貴得以懿貴妃被尊為「聖母皇太后」。於後宮，她的地位僅次於咸豐皇帝正宮皇后「母后皇太后」鈕祜祿氏。之後，在贊襄政務大臣的支持下，她在同年的九月初一日即得「慈禧太后」的封號，取得與母后「慈安太后」同等的地位。兩宮太后於清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甲子初八日正式垂簾聽政，只是，慈安太后在政務上未多作表現。同治皇帝載淳原定以「祺祥」為年號，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九日慈禧太后下懿旨改為「同治」元年（圖 15）。「同治」有與慈安太后共同輔政，⁴⁰ 或為慈禧太后與載淳皇帝共同治理國政更為貼切。

由奏摺體制的轉變，也可觀察慈禧太后政權的變化。例如，清光緒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歸政，奏摺恢復為皇帝獨立批閱的體制。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載湉皇帝的戊戌變法失敗，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度訓政，並於八月十二日起，奏摺體制又回到垂簾時期，即皇太后與皇帝並列批閱奏摺。⁴¹ 光緒皇帝失勢，有名無權，而慈禧太后於同年九月下令斬殺譚嗣同（1865-1898）等戊戌政變的支持者，即為再度掌權後，實際行使「君」政權的明顯例證。

清康熙皇帝賞臣工書法的一種功能，在籠絡漢族官僚為其效命。清晚期咸豐皇帝重用漢人，慈禧太后的同治中興即是重用漢人的成果。黎東方認為，慈禧太后掌權的第一件大政，便是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制。」⁴² 慈禧太后這項舉動，無非是

38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複製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未載年），輯 32，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奏為補授今職謝恩片〉，頁 555.2-556.1。

39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複製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未載年），輯 32，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奏為查明學政居官情形片〉，頁 556.2-557.1。

40 黎東方，《細說清朝》（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下冊，頁 500-503。

41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複製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4），輯 12，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奏陳照章懲辦情重盜匪摺〉，頁 176-177。

42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三》（長沙：岳麓書社，1989），第 0842 條，〈附錄明諭着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并着遠飭左宗棠赴浙剿賊〉，「十一月十五日」，頁 1659；

向全天下詔告重用漢人的政治謀略。她在朝其間，重用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1812-1861）、李鴻章、沈葆楨（1820-1879）等漢人官僚中堅分子，即為例證。而慈禧太后「御」書賞臣工即是籠絡漢族文士最好的工具。慈禧太后既為集結漢人，藉其力掌政權；又為承繼家規，因此，她書寫及賞大字予臣工也成為必然的日常活動，且御書內容，一式吉祥語彙是其特色。

四、慈禧太后「御」書傳達吉祥先兆

清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代年幼的同治皇帝頒下懿旨：

諭議政軍機大臣等，每年年終頒賞內外各大臣等「福」字，原為各大臣經年辦公，謹慎勤勞，特恩頒賞，以期共占祥瑞，永承錫福。現值皇考文宗顯皇帝大事，未逾期年，若即賞福字，不惟朕心追念先徽，實有未安。即爾大臣等俱受皇考深恩，亦必無賀歲之意。除在京王大臣及各省將軍督撫等應賞福字，俟二十七月後，再行賞給外。其各路統兵大臣，辦理軍務，宣力行間，勤勞倍著，應賞該大臣等福字荷包等物，著本年暫停賞給，俟期年後再行照前頒賞。將此寄知各路統兵大臣，共當感慕皇考深恩。副朕倚畀之意，各宜勤奮從公，以期永受多福。⁴³

首先，二十七個月為皇親守喪規矩。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之初，適逢年終。詔諭中，慈禧太后頒布懿旨的動機明確，嚴肅陳述皇帝「每年年終頒賞」御筆福字賞臣工為祖宗家規。藉賞「御」書福字期許受賞臣工「各宜勤奮從公」，藉此君臣得「以期共占祥瑞，永承錫福」。「占」字為「就預兆來推知吉凶」之意。⁴⁴臣工就福字的祥瑞預兆，永遠享有福報，是君臣共同的心念。無奈，現值咸豐皇帝駕崩，這項清皇室歷代先王年終必行的賞福字禮節，理應由年幼的清同治皇帝奉行。然而，輔政的慈禧太后告誡各方臣工應該節哀，並取消是年年終賞御書福字

黎東方，《細說清朝》，下冊，頁 504。

43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臺灣：華文書局，1964），冊 1，卷 11，〈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頁 24。清咸豐皇帝於十一年（1861）七月十九日駕崩，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依《實錄》書寫體例，咸豐駕崩之後至改元之前的近六個月，皆記錄在同治元年的《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中。

44 東方出版社編輯小組，《新編東方國語辭典》，（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223。

的例行活動，等來年再賞。皇室家規是制定制度的準則，不得不遵守。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案例是清朝廷絕無僅有，對整個政治體制是一大衝擊。年終賞福字既為家規，家規的沿襲與否，也直接影響君臣關係的穩定。在此，也得以一窺慈禧太后輔政之初，即懿旨延續前朝年終賞御書制度的用心。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資料觀察（參考附錄一），慈禧太后確無戲言，她於清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即開筆賞賜臣工福字。她將賞福字的舉動定位在天降祥瑞的範疇來頒布，期許君臣能「共占祥瑞，永承錫福」的初心。

其實，慈禧太后政權時期視「御」書福字為祥瑞的態度，是承繼清乾隆皇帝以來的思維。清乾隆六十年（1795）元旦，皇帝頒旨：

諭軍機大臣等，御書福字，向於臘月朔始行開筆頒賞。本日正值開筆吉期，年例皆書五福，茲特多書二福字頒賜福康安、和琳二人。共迎春祺，以為迅即成功先兆。⁴⁵

福康安（1754-1796）是乾隆帝正宮孝賢皇后的侄子，清乾隆六十年（1795）任雲貴總督；和琳（1753-1796）則為四川總督。此時正值貴州等地苗亂起，福康安及和琳兩人力平苗亂。皇帝應是為此在平亂期間特書福字賞之，以降平亂成功的吉祥先兆。在此，乾隆皇帝書寫的福字寓意著祥瑞的威神力。又如，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四日：「諭，今冬各省將軍、督、撫、奏事之便。仍照向例賞給福字，以示錫福普天，期共臻歲美人安之意」。⁴⁶是清乾隆皇帝以天子的身分代天降「祥瑞」福字予天下人，是一種能普福大眾的「吉祥物」。

此類福字的功能與前朝雍正皇帝賞福字的概念有差異。清雍正皇帝諭旨：「朕之每年頒賜福字者，蓋欲諸臣觸目警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行可以獲福之事。」⁴⁷在此，雍正皇帝賞福字是為讓臣工賭物，砥礪自己行獲福之政務，他的御書福字猶如帝王賞賜臣工一張「座右銘」。清乾隆皇帝延續雍正的傳統，且新增開筆書福字前的規矩，先到佛寺拈香，再開筆書福字，期盼「冀資佛力，普福

45 《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冊30，卷1492，〈乾隆六十年乙卯十二月戊寅朔〉，頁2。

46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冊21，卷1046，〈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十二月癸巳〉，頁3。

47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冊2，卷51，〈雍正四年十二月庚辰條〉，頁28。

蒼生，亦有合於冀疇敷錫之意。」⁴⁸ 乾隆皇帝賞福字多了一層佛力加持的性質，實有別於雍正時期「座右銘」式的思維。亦即，乾隆朝賞福字是由皇帝代天直接賜福人間，且御書福字具有「神力」性質。關於此，清乾隆時期的戲曲作家李斗（1749-1817），在《揚州畫舫錄》中記錄官民供奉龍匾御書的事跡：

本朝元旦朝賀，自王公以下至三品京堂官止，例得恭邀頒賜「福」字，各官敬裝匾，供奉中堂，以為奕世光寵。南巡時各工皆賞「福」字，如辛未則與石刻〈坐秋詩〉、〈水嬉賦〉同賞之類。工商敬裝龍匾，恭摹於心字板上，擇園中廳事未經署名者懸之，謂之「福字廳」。⁴⁹

臣工及民間工商業者得御書福字之後，裝裱供奉正廳中，命廳室為「福字廳」，視受賞御書福字為家族代代的榮耀。工商業者更是待富貴利達，成為知名商號後，擴建福字廳或去舊換新福字，是當時揚州富賈的寫照。侯皓之並認為，臣民對待御賞福字的態度，充分反映盛清時期百姓藉御書福字祈求天庥，乃至富貴利達的期盼。⁵⁰ 在此，御書福字被神格化，成為一種「吉祥物」。清道光延續乾隆時期的概念，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仁宗駕崩後，道光皇帝旻寧（1782-1850；1820-1850 在位）在當年年終的十一月頒諭旨：

諭，軍機大臣等、每遇年終，頒賞內外臣工福字。原為內外諸臣終歲經理公務，謹慎黽勉。節屆新春，特恩錫福，共迓吉祥，永受恩澤之意。現屆應賞之期，惟朕遇皇考仁宗睿皇帝大故，未及一週。即書福字頒賞諸臣，思及先恩，朕心誠有不安。即諸臣皆係久受皇考殊恩之人，現在二十七箇月之內，亦必無意思及年節。應賞京城王大臣，及各省將軍大臣福字，俟二十七箇月後，再行照例賞給。新疆職司外藩，與內地不同，應賞將軍大臣福字荷包等項，仍照嘉慶四年例，本年暫行停止，俟明年週年，再照從前賞給。遇便寄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傳諭各城大臣知悉。共戴皇考之恩，以副朕任用之意。其各黽勉從事而期永享福澤。⁵¹

48（清）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收入《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冊10，卷84，〈嘉平月朔之作〉，頁28。

49（清）李斗，《揚州畫舫錄》（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卷17，〈工段營造錄〉條，頁886-887。

50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頁128-129。

51《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冊1，卷9，〈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己巳〉，頁21-22。

清道光皇帝諭群臣，賞福字的意圖在「特恩錫福，共迓吉祥，永受恩澤之意」。「迓」字寓意預先迎接未到之意，特賞福字以迎接未來無限的福澤。福字是一種祥瑞，它的出現能預先報知未來的美好。是一種「吉祥物」，由帝王書寫、賞賜的書法作品。慈禧太后遵循祖宗家規，日常、年初、年終「製造」並賞賜「吉祥物」福字，為她活動的寫景。然而，清同治元年（1862）的懿旨為慈禧太后輔政之初所下，之後的四十八年，清同光時期賞御書福字的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受賞者的反應？如慈禧太后於咸豐十一年（1861）下懿旨的初心，御書福字與祥瑞政治的關係又是如何？關於此，學界迄今未進一步討論。職此之故，觀察清同光時期慈禧太后書寫福字的企圖，應有助於瞭解她當時施政的手段。以下章節擬彙整清同光年間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錄御筆書畫交辦事項的史料，並藉清代《軍機處檔奏摺》、《翁同龢日記》及《劉坤一遺集》等相關記載，試圖釐清慈禧太后掌政期間賞書法福字的操作脈絡，藉此說明書法是慈禧太后製造的一種祥瑞，透過賞賜，鞭策臣工戮力為政，以達到君臣同心的政治權謀。

五、慈禧太后賞「御」書的操作案例

慈禧太后賞「御」書的時機及臣工寫謝恩賞摺的案例，可分為壽賞御書及年終賞「御」書兩部分來觀察。

（一）壽賞御書

據雍正朝以來的《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紀錄，帝王、皇太后壽誕及臣工生日是賞御書的契機。御書的內容除了字對、匾額，又以福字的紀錄最多。受賞的對象主要集中在皇后、親王、福晉、貝勒及妃嬪等皇親國戚，欽差大臣及總督等近臣；也賞臣工高齡的父母或地方特殊要求。⁵² 清雍正、乾隆朝在壽賞御書的習慣上，並沒有分內外或階層之別。⁵³ 據同光時期《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紀錄觀察，慈禧太后掌政時期延續賞賜對象的多元性。然而，因她身為女性的角色，因此也積極接觸各級官員女眷及外國使節婦女圈，是她與歷朝帝王最大不同之處（圖

52 據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一文的統計，清雍正十四年之間，臣工謝恩賞「福」字的奏摺，可尋的約二百餘件；清乾隆六十年則為三百餘件，見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頁115、12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奏摺》原件統計（參考本文附錄二），清同光朝奏謝恩賞福字摺約收錄了約五百件。

53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頁126。

16)。至於慈禧太后是否也賞賜外國使節婦女圈「御」書福壽字，尚有待檢視。相對的，在滿、漢族的婦女圈中，慈禧太后賞福、壽「御」書的案例，屢見不鮮。例如，孔子第七十六代子孫孔令貽（1872-1919）的母親彭氏及妻子曾受邀入宮，晉賀皇太后六旬萬壽。慈禧太后「賜他們御筆福壽字，御筆松鶴圖、御筆蕃桃圖等」，以示榮寵。⁵⁴

受賞御書的臣工「次日遞摺謝恩」為恆例。清乾隆時期，外任官僚受到御書時，首先需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問候君主再謝恩。⁵⁵而寫謝恩賞摺的恆例在慈禧太后掌權時期，依然承續著。清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六日立春，同治帝滿十三歲，並親書福方賞內廷樞要。當時翁同龢即紀錄，受賞者需遵「次日具摺謝賜福字」⁵⁶的宮中規矩。

清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李鴻章七旬大壽，慈禧太后「御」書〈調鼎凝釐〉匾額、〈棟樑華夏資良輔，帶礪山河錫大年〉對聯、〈福〉、〈壽〉及〈益壽〉字幅，並有御筆〈蕃桃圖〉（圖 17）、〈無量佛〉及〈膝貂褂〉諸珍物賞之。⁵⁷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春，她再賞李氏「御筆福字一張、壽字一張、松鶴字一張」。⁵⁸而同年端陽節，她已特賞李鴻章〈御筆芝松摺扇一柄〉。李氏在謝恩賞摺中提道「自願菲材」卻得到厚植，因此惟有「勉奮衰庸，冀酬高厚，常懷曝獻詠芝桂，以祝長春敬繹。」（圖 18）⁵⁹此時適逢甲午戰爭年間，北洋水師總指揮官李鴻章扮演著重要角色。慈禧太后的「御」書賞賜讓李鴻章時時警惕自己戮力為公，承諾對朝廷的忠貞。這張謝恩賞摺的內容，也必定是慈禧太后賞賜最重要的目的。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二日，兩江總督劉坤一五十壽辰，慈禧太后已於同年十一月交造辦處裝裱御筆壽禮，匾額、對聯、福及壽字。⁶⁰賞賜

54 張臨生，〈孔德成先生與故宮〉，《故宮文物月刊》，363期（2013.6），頁61-62。

55（清）吳振棫，《養古齋叢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6），編43，卷25，頁271-272。

56《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2，「同治（辛未）十年十二月（一八七二、一）」十六日，頁633。

57《清史列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2），冊8，卷57，頁10。

58 直隸總督李鴻章具奏，《軍機處檔光緒朝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129864，箱號2729），光緒二十年一月二日。

59 直隸總督李鴻章具奏，《軍機處檔光緒朝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132540，箱號：2729），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二日。

60《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匣裱作、油木作呈稿〉，頁204。

時，她並加御筆菊花四幅及蟒袍等禮物。劉坤一在謝恩賞摺中承諾「臣子惟有益加感奮，勉竭惓忱。」⁶¹ 實際上，劉氏對皇室一世忠貞，政績不凡。因此「御」書恩賜，更堅定自己對「天子」慈禧太后的忠誠。整合李鴻章及劉坤一的謝恩賞摺內容，慈禧太后賞「御」書及臣工書寫的謝恩賞摺是形成君臣對話的媒介。臣工體察上意，並與慈禧太后同心，為國為民。

耙梳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軍機處檔奏摺》，清同光兩朝受賞御筆福、壽字的臣工，其書寫謝恩摺的案例約五百則（參考附錄二）。其中，清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十日適逢慈禧太后六旬大壽，慶典已於光緒十九年（1893）由禮親王世鐸（1843-1914）等人開始籌備。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到達北京之後，即接獲九月二十六日光緒皇帝上諭福字等賞賜：

朕親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所有此次呈進貢物之王宮大臣等，著各賞給福字一方，壽字一方，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尺頭二疋」。又欽奉十月初一日上諭：「朕親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各省總督著各賞大壽字一張，大緞二疋，帽緯一匣，以示行慶施惠至意」等因，欽此。又十月二十日解貢委員齋回皇太后特賞壽字一方，蟒袍一件，活計一匣。⁶²

不論清光緒皇帝是否有實質的帝王權力，慈禧太后壽辰賞賜為朝廷政務，依規矩，壽禮理應由清光緒皇帝親自頒發。這年適逢清日甲午戰爭期間，兩江總督劉坤一對「恩遇」，在謝恩賞摺中表示「惟有奮勉圖功，冀伸敵愾同仇之氣，馳驅報國，無負推恩錫類之仁。」⁶³ 是臣子受賞後，積極忠貞報國的自省。觀察臣工謝恩賞摺內容，慈禧太后為了六旬大壽，於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日特頒賞各方臣工福字及絲緞等禮。在光緒二十年（1894）這一年，各方巡撫、總督、各鎮總兵、將軍等陸續書寫謝恩賞摺，因此，這年的謝恩賞摺紀錄至少八十則，為四十八年中最多的一次（參考附錄二）。臣工們藉由這次賞福字的機緣，在謝恩賞摺中寫下激勵自我從政、帶兵等以示忠誠的語詞。例如，貴州送鎮總兵和耀曾（1834-1897）自省並期許「嚴紀律於三軍，蠻服永息」（圖 19）。⁶⁴ 和耀曾是雲

61（清）劉坤一，《劉坤一遺集》，收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上海：中華書局，1959），冊3，卷33，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七日〈贈壽謝恩摺〉，頁1207-1208。

62（清）劉坤一，《劉坤一遺集》，冊2，卷22，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恭謝恩賞摺〉，頁829。

63（清）劉坤一，《劉坤一遺集》，冊2，卷22，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恭謝恩賞摺〉，頁829。

64《軍機處檔光緒朝奏摺》，光緒二十年三月十二日〈貴州送鎮總兵和耀曾具奏〉（國立故宮博物

南麗江人，清同光年間平雲貴等處回亂有功，對皇室一世忠貞。⁶⁵ 新授甘肅提督李培榮（約活動於光緒年間，1875-1908）則承諾「講求軍政，邊陲固」。⁶⁶

觀察謝恩賞摺的案例，在前半段，臣工不免八股式的對慈禧太后請安；但後半段為臣工藉受賞福字的契機向皇室奏報業務，並自省處理政務的成果，鞭策改善及表達對皇室的忠誠之意。慈禧太后掌政時期承襲清高宗乾隆以來在賞「御」書謝恩賞摺上不多著墨，幾乎僅批「覽」或「知道了」幾個字，⁶⁷ 意此事不需再寫題本上奏，就此結案。如此簡單扼要的批閱，其原因應與軍機處職掌的權力完備，全力支援皇帝處理奏摺事務，並提高對臣工的行政管理權有關。更何況，清乾隆皇帝已不再比照雍正時期，緊盯、訓諭官員的批覽奏摺態度。⁶⁸ 清同光時期受賞的謝恩賞摺硃批原則，應該也是承襲乾隆朝，由軍機大臣代理的分工體制。

慈禧太后賞臣工「御」筆福字及臣工書寫謝恩賞摺，如此一來一往，形成君臣之間對話的模式。君主慰勞臣工的辛勞，臣工思考一己所作所為是否有愧於帝王之賞賜，並激勵自己心繫朝政，戮力為公。臣工的謝恩賞摺是對慈禧太后忠心的承諾，也是皇室所期盼的「君」臣關係。賞「御」書是慈禧太后行有清一朝「君」王權利的表現。「御」書成為雙方溝通的媒介，也是慈禧太后掌政時期不斷努力練習書法大字的重要原因。

（二）年終賞「御」書

清同光時期年終賞賜福字為盛典，賞福字具「共占祥瑞，永承錫福」的心願。如她在咸豐十一年（1861）底垂廉聽政之初，懿旨眾大臣「共戴皇考之恩，仰副朕倚任之意。務各奮勉趨公，常受其福。」⁶⁹ 明示年終賞福字的目的是在勉勵臣工思皇恩，莫忘倚任的初心，務求戮力政務，以求受福。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紀錄，從清同治元年（1862）年底起，幾乎每年的十至十二月間，清皇室固定書寫「福」字賞賜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及各路欽差大臣（參考附錄一）。⁷⁰ 每

院藏：文獻編號 132337，箱號：2729）。

65 《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9），冊 13，卷 463，〈列傳 243〉，頁 10621-10626。

66 《軍機處檔光緒朝奏摺》，光緒二十年四月九日〈新授甘肅提督李培榮具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408005789，箱號：2729）。

67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頁 124-132。

68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頁 132。

69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冊 1，卷 11，〈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頁 24。

70 同治六、七、十年間的年終賞御書福壽字的傳統，並未曾間斷。參考《左宗棠全集·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9），冊 3，第 0822 條〈御賞福壽字荷包等項謝恩摺〉，頁 404。「同治六

年約準備二十五張左右的福字，並有銀錢、銀鏢及大、小荷包等必備的賞賜品，或偶有食物奶餅等。⁷¹賞禮裝箱，快馬遙送大年期間仍鎮守邊地的臣工。御書壽字的賞賜，通常則是贈予當時壽誕的臣工。清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年終賞賜直隸總督曾國藩（1811-1872），賞單內容有「福字、荷包、銀錢、銀鏢、食物」等項。這一年，適逢曾氏五十大壽，慈禧太后在年終賞單中並加賞「壽」字一張，即為案例。⁷²對於在朝為清皇室獻策、處理政務的內閣軍機大臣們，皇室在年終賞福字當天，更有既定的儀式。觀察《翁同龢日記》的紀錄，清光緒皇帝親政後，賞福字的時間點大多出現在十二月初一日前後。翁同龢並詳盡記錄年終賞福字的過程。光緒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一日：

上至頤年殿面賜成之福字。辰初到苑門，須臾駕至，諸臣站班，復在六項公所候……至豐澤園東西廂分坐。辰正一刻樂作，內監帶入，序立西階下，皇太后南嚮〔嚮〕坐，上南面立，前設案筆墨具（福錕傳今日賞飯，群臣上階三叩頭退，下階，賞字時一跪六叩），群臣以次歷階升，候於戶外，受賜者入戶上墊〔殿〕跪，上揮翰至末數筆即連叩頭訖，福字從身上搭過，謂之滿身都是福也。壽字亦上親書，前數日寫就，旁一人捧而出，受賜者隨而出。出豐澤園門，交懋勤任太監歸匣（木匣），搭至大院晾乾再送。退後至箱〔廂〕房入坐，喫飯畢，少頃傳退，遂退。計寫字時約二刻餘。⁷³

受賞者計有「御前四人、軍機三人，（餘二人在假亦賞）、毓慶宮三人、內務府五人、協辦二人、尚書四人、總憲二人」，⁷⁴共二十五人。受賞大臣須賞銀兩與奏事處、捧福、壽字等內臣，並接受賞出席者人數勻攤。明年，光緒十九年

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冊3，第0933條，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御賞福壽字荷包等項謝恩摺〉，頁596-597。同治十年的年終賞賜，則參考《左宗棠全集·奏稿》，冊5，第1481條，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御賞福壽字荷包等項謝恩摺〉，頁193。

71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油木作呈稿〉，頁508。其實，年終賞大臣的大字，根據翁同龢記載，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皇太后賜臣大龍字一幅，福壽字各一幅」。參考趙中孚編輯，《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3，頁1520，「光緒（丁亥）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72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91），冊5，第1296條，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附錄軍機大臣咨文·同治元年年終賞賜〉，頁3008。

73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光緒（壬辰）十八年十二月（一八九三、一）」臘月朔，頁1798-1799。

74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光緒（壬辰）十八年十二月（一八九三、一）」臘月朔，頁1798-1799。

(1893)，翁氏紀錄慈禧太后入座後作樂（有例戲），且生動記錄當時的情境：

諸臣序立於廷中階下。上貂褂紫袍，卷〔捲〕右袖，就方案南嚮立。筆墨具受賜者北面跪，俟書至福字右口字，即連六叩頭，未叩伏俟將福方從身上過乃起，側行出門趨下，至豐澤門外。⁷⁵

年終賞御書福字，福字本身就充滿吉祥意。受賞者的反應又是如何？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終受賞福字謝恩賞摺中表示「惟有服勤磨盾，激勵傳餐，期蕩定夫封圻，冀仰紓乎宵旰。同文化洽，胥薄海以歸仁。含哺歡臚，普群黎而遍德」的志向。⁷⁶是藉賞的契機，激勵、積極反省政務，更與君主同心，期許國事太平，四海歸化的願景。

左宗棠在同治五年（1866）正月二十日〈御賞福壽字荷包等項謝恩摺〉中認為受賞的御書福壽字具有「熙春遍德，合八閩兩浙，而億兆沾恩」⁷⁷的祥瑞意涵。即使在甲午戰爭期間，年終賞各方臣工御筆福字的傳統，仍如期進行（參考附錄一）。例如，光緒二十年（1894）十二月除夕日，翁同龢等樞要受光緒皇帝賞御筆福字。然，或因戰事衝擊，翁同龢當晚在日記中即自省：

自念以菲材而當樞要，疆事如此，上無以對大造之恩，下無以慰薄海之望，於講惟無補救，於同列則致猜疑，疾病纏綿，求死不得，悠悠蒼天，曷其有極。⁷⁸

翁同龢如此深刻的回首自我，是因御賞福字，原意帶來君臣共享福祉的期望，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初的懿旨。如今，國事危艱，翁氏不免自責。據謝恩賞摺的內容，無論是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年終賞福字，無非是讓臣工思惟職責，表達忠君，君臣同心共濟，為國為民的一種意圖。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當陝甘總督新疆巡撫陶模（1835-1902）在肅州途中接獲御書「福」字賞賜時，於二月初六日即書謝恩賞摺，並強調「自天錫祉，伏地增慚，臣惟有激勵軍心，布揚

75（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光緒（癸巳）十九年十二月（一八九四、一）」朔，頁1854。慈禧太后掌權年間，宮中年終賞「御」書並無固定內容，例如「光緒十七年則於十二月三十日」賞群臣「益壽」字。參考《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頁1745。

76（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六》（長沙：岳麓書社，1989），第1323條，〈同治元年年終賞賜謝恩摺〉，二月十五日，頁3166。

77（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長沙：岳麓書社，1989），第0615條，〈御賞福壽字荷包等項謝恩摺〉，正月二十日，頁2。

78（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冊4，「光緒（甲午）二十年十二月（一八九五、一）」，頁1933。

聖德」(圖 20)。⁷⁹ 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二年(1896)間陝甘地區回亂，「二十二年元夕，薄北大通營，敗歸」，陶模「遣涼州戎軍赴援」，並於二月破回亂「所領十大莊堡，戮其首，殲數千人，諸回氣奪」。⁸⁰ 收到御書福字賞賜的時間點，陶模正處於兩軍交戰的前線，御書福字的適時到來，猶如「自天錫祉」，祥瑞天降，足以激勵軍心。在此，清帝賞賜的福字，猶如君主有德，天降祥瑞，激勵人心，是類似漢代以來天人感應的祥瑞政治思維模式。不同的是，自漢代以來，天人感應天降祥瑞的模式，向以大自然的動植物及天象的變化為象徵，而清皇室，慈禧太后則以「御」書的方式來表示。

六、結語

細思慈禧太后賞「御」書的性質，帝王是祥瑞的製造者；透過賞賜，把祥瑞分給臣工，是一種分祥的行為。實際上，御筆墨寶賞臣工並非清皇室的專利，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 在位)、宋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 在位)、宋徽宗趙佶(1082-1135；1100-1126 在位)皆有對忠直勵行的侍臣賞予御書的案例。學界認為，唐宋帝王御書是一種皇權統御的媒介，獲御書賞賜是帝王對臣子最高榮寵的表示。⁸¹ 是透過御書內容的視覺角度，宣揚帝王政策和施政的正確性，以達到皇室與地方對話的目的。⁸² 康熙皇帝藉賞賜御書，期許君臣之間能有良好互動，藉此達到君臣同心的政治生命理念。⁸³ 慈禧太后承襲清康雍乾以來，帝王書寫御書，賜福臣工的傳統。此類由她書寫出來的「御」書祥瑞實有別於漢代以來，由百姓、官員呈報地方出現龍鳳、麒麟，或呈進歧麥、嘉禾、白狼、連理枝等祥瑞或咎徵的樣式。實際上，唐宋以來，祥瑞出現的主導權已由帝王取代，「造

79 (清)陶模奏，《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輯 9，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奏為恭謝天恩賞賜福字摺〉，頁 693。

80 《清史稿校註》第 13 冊，卷 454，〈列傳 234〉，頁 10519。

81 宋曉希，〈御書賞賜的文治氣象——宋太宗與唐宋御書政治文化的傳承與轉型〉，《北京社會科學》，2016 年 12 期，頁 13-21。

82 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e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t 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2-233, 245-258; Julia K. Murray,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in *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18 (1986): 41-59.

83 莊吉發，〈翠華南幸·揚州寫真——盛清君臣眼中的揚州〉，收入馮明珠主編，《盛清社會與揚州研究——恭賀陳捷先教授八秩華誕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頁 190-191、222-225。

瑞」成為帝王鞏固政權及政治造勢的權謀。⁸⁴而慈禧太后「御」書特恩頒賞內廷、外朝臣民，「以期共占祥瑞，永承錫福」的目的，反映書寫御書是她造祥的活動，並藉機分祥予臣工，是確立政治地位的一種必要活動。她的「御」書福字，猶如「天子」降祥瑞予臣工，內容充滿對未來吉祥的預兆。在清代官僚體制下，臣工謝恩賞摺的回應，更像一帙對慈禧太后承諾忠貞效命的契約書。

過去史學家對慈禧太后的評論多極為負面，認為其為一弱女子，「自己不循祖宗家規」，卻動輒以家規來規範所有人。其中李鴻章、左宗棠及曾國藩等有才之人，即在遵循家規的操弄下臣服於她。⁸⁵對慈禧太后類似的評論，幾乎成為二十世紀史學界共通的語言。二十一世紀以來，學界試圖對此類獨斷性的看法提出檢視。陳捷先讚揚慈禧太后努力學習政務的過程，但對其書寫大字及畫畫的評論仍然無法跳脫「為一項好的嗜好，尤其能幫助她消磨寡居孤獨的時光」。當論及慈禧太后專攻書寫福、壽等大字時，就「以便在年終書寫賞賜給大臣」當結論了。⁸⁶透過本文的分析，可觀察到慈禧太后掌政時期賞臣工「御」書，是對祖宗家法的遵循，以達到君臣對話的政治權謀。「御」書的效應，具有鼓勵臣工積極反省政務及提醒自己對皇室的忠誠。這項忠誠的承諾在慈禧太后掌政近半世紀期間是顯見的。尤其在烈強割據的清光緒年間，清國土卻未出現地方割據的分裂局面，應該是慈禧太后與各地臣工同心，緊密合作捍衛的實際成果。在此，「御」書即扮演了「君」臣之間的溝通媒介，是政治權謀落實的一種工具。

總之，過去學界認為實權在握的慈禧太后，只是在生活閒暇書寫、並肆意賞賜臣工的觀點，就本文分析，慈禧太后「御」書的動機，常超越休閒的層面。而造成對慈禧太后書寫及賞「御」書的偏解，應是學界多年來對她掌權的認同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後記] 筆者撰寫期間，承蒙莊吉發教授給予諸多協助，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及季刊執行編輯陳韻如研究員惠賜寶貴意見，特此感謝，惟一切文責筆者自負。

84 劉言，〈“祥瑞”與明代政治〉（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9-11。

85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2），上冊，頁124-125。

86 陳捷先，《慈禧寫真》（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頁259、288-290。

附錄一 清同光時期年終賞福字《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清單

交出活作日期	受賞者	賞御書清單	報單交出時間
同治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西北兩路將軍 大臣伯克	金福字九張 壽字一張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紀錄 35.31.583
同治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軍營欽差大臣	福字二十張 壽字三張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紀錄 35.31.583
同治二年 十二月初一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福字九張 壽字一張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35.233.583
同治二年 十二月初一日	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二十張 壽字七張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35.233.583
同治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等	福字七張 壽字一張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紀錄 35.449.583
同治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三張 壽字六張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紀錄 35.449.583
同治五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九張 壽字五張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紀錄 36.530.582
同治五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等	福字四張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紀錄 36.530.582
同治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等並賞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九張 壽字一張	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紀錄 38.58.572
同治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等	福字七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39.9.514
同治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四張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紀錄 40.194.534
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及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四張 壽字一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紀錄 41.546.588
光緒元年 十二月初六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伯克 等	福字十張 壽字一張	光緒元年十二月八日紀錄 42.211.558
光緒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 軍營大臣等	福壽字十一張	光緒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紀錄 42.336.558
光緒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 軍營大臣等	福壽字八張	光緒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紀錄 42.428.558
光緒四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軍營將軍大臣 等	福字九張	光緒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紀錄 43.5.56
光緒六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並欽 差大臣等	福字十三張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43.352.563
光緒八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	福字八張	光緒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紀錄 44.122.571
光緒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 欽差大臣	福字十三張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四日紀錄 44.525.571

交出活作日期	受賞者	賞御書清單	報單交出時間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大臣等	福字二十一張 壽字一張	光緒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紀錄 45.353.617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六張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46.70.590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六張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紀錄 46.378.590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六張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紀錄 47.3.565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四張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紀錄 47.508.565
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西北兩路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二張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紀錄 48.489.565
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西北兩路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三張	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紀錄 49.42.543
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並軍營欽差大臣	福字十一張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紀錄 49.414.543
光緒十八年七月初三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並軍營欽差大臣	福字十一張	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紀錄 50.269.606
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並軍營欽差大臣	福字十一張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紀錄 51.14-15.496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九張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紀錄 51.271.496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四張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紀錄 52.117.522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一張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紀錄 52.309.522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張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54.88.579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四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紀錄 54.238.579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賞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一張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紀錄 54.567.579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二張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紀錄 55.233.555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三張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紀錄 56.58.569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張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紀錄 56.286.569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賞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並軍營欽差大臣等	福字十張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紀錄 57.48.569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附錄二 清同光朝奏謝年終謝恩賞福壽字統計表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同治二年	閻敬銘	山東巡撫	共四人
	吳棠	漕運總督	
	馮子材	--	
	雷正綰	署固原提督	
同治三年	李鴻章	江蘇巡撫	共十四人
	楊岳斌	福建水師提督	
	嚴樹森	湖北巡撫	
	曾國藩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	
	彭玉麟	兵部左侍郎	
	曾國荃	留辦金陵軍務浙江巡撫	
	鮑超	浙江提督	
	惲世臨	湖南巡撫	
	駱秉章	督辦四川軍務四川總督	
	徐宗幹	福建巡撫	
	張凱嵩	廣西巡撫	
	賈洪詔	雲南巡撫	
	毛鴻賓	兩廣總督	
喬松年	安徽巡撫		
同治九年	劉嶽昭	革職留任雲貴總督	共五人
	李鴻章	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	
	何璟	山西巡撫	
	丁寶楨	太子少保銜山東巡撫	
	劉銘傳	督辦陝西軍務	
同治十年	李鶴年	頭品頂戴河南巡撫	共十人
	馮子材	廣西提督	
	郭柏蔭	湖北巡撫	
	李瀚章	湖廣總督	
	劉坤一	江西巡撫革職留任	
	楊昌濬	浙江巡撫	
	劉崐	湖南巡撫	
	吳棠	頭品頂戴四川總督	
	張兆棟	漕運總督	
	劉嶽昭	革職留任雲貴總督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同治十二年	岑毓英	雲南巡撫	共七人
	丁寶楨	山東巡撫	
	李鴻章	直隸總督	
	錢鼎銘	河南巡撫	
	鮑源深	山西巡撫	
	文彬	署理山東巡撫漕運總督	
	邵亨豫	陝西巡撫	
同治十三年	喬松年	河東河道總督	共二十四人
	李宗義	兩江總督	
	馮子材	廣西提督	
	郭柏蔭	湖北巡撫	
	王文韶	湖南巡撫	
	李瀚章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	
	雷正綰	陝西固原提督	
	張樹聲	江蘇巡撫	
	吳棠	四川總督	
	英翰	太子少保安徽巡撫	
	王凱泰	福建巡撫	
	劉坤一	江西巡撫革職留任	
	張曜	廣東陸路提督	
	喬松年	河東河道總督	
	長順等	--	
	楊昌濬	浙江巡撫	
	左宗棠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	
	宋慶	湖南提督	
	劉長佑	廣西巡撫	
	曾璧光	--	
	劉嶽昭	頭品頂戴雲貴總督	
	張兆棟	廣東巡撫	
錢鼎銘	河南巡撫		
丁寶楨	太子少保銜山東巡撫		
光緒二年	左宗棠	欽差大臣大學士督辦新疆軍務陝甘總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輕車都尉	共一人
光緒三年	左宗棠	欽差大臣大學士督辦新疆軍務陝甘總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輕車都尉	共一人
光緒四年	左宗棠	欽差大臣大學士督辦新疆軍務陝甘總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輕車都尉	共一人
光緒六年	錫綸等	--	共一人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光緒九年	宋慶	四川提督	共三人
	崇綺	--	
	卞寶第	署湖廣總督湖南巡撫	
光緒十年	張之洞	山西巡撫	共二十四人
	鹿傳霖	河南巡撫	
	裕祿	安徽巡撫	
	吳長慶	幫辦山東海防廣東水師	
	彭祖賢	湖北巡撫	
	譚鍾麟	陝甘總督	
	彭玉麟	欽差辦理廣東防務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楊昌濬	漕運總督	
	左宗棠	兩江總督	
	衛榮光	江蘇巡撫	
	劉錦棠	督辦新疆軍務	
	潘蔚	江西巡撫	
	丁寶楨	四川總督	
	何璟	閩浙總督	
	張兆棟	福建巡撫	
	張樹聲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	
	杜嘎爾等	--	
	張凱嵩	--	
	劉秉璋	浙江巡撫	
	徐延旭	廣西巡撫	
張曜	廣東陸路提督		
岑毓英	雲貴總督		
倪文蔚	廣東巡撫		
唐炯	摘去頂戴革職留任雲南巡撫		
光緒十五年	慶裕	--	共十七人
	克蒙額	--	
	長順	--	
	安德等	--	
	尚宗瑞	--	
	杜嘎爾等	--	
	豐紳	--	
	岐元	--	
	升泰	--	
	宗室鍾泰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鐘泰	--	
	繼格	--	
	色楞額	--	
	恭鏜	--	
	額爾精額	--	
	尚宗瑞	--	
	崧駿	浙江巡撫	
光緒十六年	崧駿	浙江巡撫	共十六人
	長順	--	
	依克唐阿	--	
	尚宗瑞	--	
	克蒙額	--	
	安德	--	
	長庚	--	
	長庚	--	
	宗室祥亨	--	
	長庚	--	
	吉和	--	
	岐元	--	
	色楞額等、富勒銘額	--	
	長順	--	
	定安	--	
光緒十七年	裕祿	--	共二十人
	長順	--	
	尚宗瑞	--	
	托克湍	--	
	安德、那遜緯克圖	--	
	豐紳	--	
	祥亨	--	
	克蒙額	--	
	吉和	杭州將軍	
	希元	--	
	岐元	--	
	繼格	--	
	額爾慶額等	--	
	長庚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鍾泰	--	
	升泰	--	
	依克唐阿	--	
	富勒銘額等	--	
	定安	--	
光緒十八年	裕祿	--	共二十三人
	克蒙額	--	
	安德等、那遜綽克圖	--	
	長順	--	
	希元	--	
	祥亨	--	
	豐紳	--	
	吉和	--	
	永德等、魁福	--	
	繼格	--	
	升泰	--	
	依克唐阿	--	
	鍾泰	--	
	長庚等、富勒銘額	--	
	額爾慶額等	--	
	奎煥	--	
	定安	--	
	裕祿	--	
	譚繼洵	頭品頂戴湖北巡撫	
光緒十九年	譚繼洵	頭品頂戴湖北巡撫	共十六人
	長順	--	
	依克唐阿	--	
	永德等、魁福	--	
	榮祿	--	
	祥亨	--	
	希元	--	
	鍾泰	--	
	恭壽	--	
	吉和	--	
	奎煥	--	
長庚等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裕寬	頭品頂戴河南巡撫	
	--	尚書、頭等頂戴、西安將軍	
	陶模	頭品頂戴甘肅新疆巡撫	
光緒二十年	陶模	頭品頂戴甘肅新疆巡撫	共八十餘人
	李鴻章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	載遷等各三
	許振祿	河東河道總督	張、周瑞龍二
	廖壽豐	新授浙江巡撫	張、李占椿二
	沈秉成	安徽巡撫	張、和耀曾二
	鹿傳霖	陝西巡撫	張、何明亮二
	張煦	山西巡撫	張、張松林二
	張之洞	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	張、任祖文二
	劉坤一	兩江總督	張、吳大澂二
	松椿	漕運總督	張
	裕寬	河南巡撫	
	德馨	江西巡撫	
	楊昌濬	陝甘總督	
	張聯柱	廣西巡撫	
	李瀚章	兩廣總督	
	劉永福	閩粵南澳鎮總兵	
	鄧萬林	廣東碣石鎮水師總兵	
	邵友濂	福建台灣巡撫	
	譚繼洵	湖北巡撫	
	程之偉	山西大同鎮總兵	
	崧蕃	貴州巡撫	
	秦懷亮	福建建寧鎮總兵	
	侯名貴	記名提督福建漳州鎮總	
	陳鳳樓	江南徐州鎮總兵	
	陳鳳樓	江南徐州鎮總兵	
	李占椿	安徽皖南鎮總兵	
	李占椿	安徽皖南鎮總兵	
	陳永春	浙江定海鎮總兵	
	陶模	甘肅新疆巡撫	
	和耀曾	記名提督貴州鎮遠鎮總兵	
	和耀曾	--	
	喻俊明	記名提督浙江衢州鎮總	
	李培榮	新授甘肅提督	
	劉秉璋	革職留任太子少保四川	
	周瑞龍	湖南鎮筵鎮總兵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周瑞龍	湖南鎮筵鎮總兵	
	陳金鰲	四川松藩鎮總兵	
	劉士奇	四川建昌鎮總兵	
	何乘鰲	四川川北鎮總兵	
	張松林	記名提督雲南騰越鎮總兵	
	張松林	記名提督雲南騰越鎮總兵	
	譚鈞培	雲南巡撫	
	蔣雲龍	陝西延榆綏鎮總兵	
	董履高	廣西左江鎮總兵	
	萬國本	記名提督福建臺灣鎮總兵	
	周振邦	福建臺灣澎湖鎮總兵	
	何明亮	江西南贛鎮總兵	
	何明亮	--	
	任祖文	正任安徽壽春鎮總兵	
	任祖文	正任安徽壽春鎮總兵	
	孫昌凱	浙江海門鎮總兵	
	張俊	伊犁鎮總兵	
	吳大澂	湖南巡撫	
	吳大澂	湖南巡撫	
	何長清	--	
	黃萬鵬	阿克蘇鎮總兵	
	楊昌濬	陝甘總督	
	裕祿	--	
	長順	--	
	榮祿	--	
	豐紳	--	
	安德	--	
	祥亨	--	
	恭壽	--	
	永德等、魁福	--	
	希元	福州將軍	
	克蒙額	--	
	吉和	--	
	奎煥	--	
	繼格	--	
	富勒銘額等	--	
	長庚等	--	
	鍾泰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載遷等	--	
	載遷等	--	
	載遷等	--	
	豐紳	--	
	王文韶	雲貴總督	
	陳鳳樓	江南徐州鎮總兵官	
光緒二十一年	裕祿	--	共十二人 崇清二幅、 魁福二幅
	長順	--	
	恩澤	--	
	國俊	--	
	克蒙額	--	
	安德、那遜綽克圖	--	
	祥亨	--	
	崇清、魁福	--	
	崇清、魁福	--	
光緒二十二年	長順	--	共二十一人
	依克唐阿	--	
	桂斌、那遜綽克圖	--	
	永德	--	
	國俊	--	
	崇歡等、魁福	--	
	豐紳	--	
	祥亨	--	
	恭壽	--	
	吉和	--	
	恩澤	--	
	富勒銘額等	--	
	保年	--	
	長庚等	--	
	劉樹堂	河南巡撫	
	文海	駐藏辦事大臣副都統	
	董福祥	尚書銜總統甘軍甘肅提	
	譚繼洵	頭品頂戴兼護湖廣總督湖北巡撫	
	魏光燾	總統湘軍頭品頂戴調補陝西巡撫	
	光緒二十三年	饒應祺	
依克唐阿		--	
連順		--	
連順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永德	--	
	豐紳	--	
	國俊	--	
	祥亨	--	
	濟祿	杭州將軍	
	崇清等	--	
	保年	--	
	恭壽	--	
	富勒銘額	--	
	恩澤	--	
	長庚等	--	
	長庚	--	
	胡聘之	山西巡撫	
	劉坤一	兩江總督	
	趙舒翹	江蘇巡撫	
	邊寶泉	閩浙總督	
	松椿	漕運總督	
	陳寶箴	湖南巡撫	
	譚鍾麟	兩廣總督	
	德壽	江西巡撫	
	許振祿	廣東巡撫	
	廖壽豐	浙江巡撫	
	譚繼洵	湖北巡撫	
史念祖	廣西巡撫		
鹿傳霖	四川總督		
鍾泰	--		
饒應祺	甘肅新疆巡撫		
光緒（未記年）	嵩崑	貴州巡撫	共一人
光緒二十三年	崧蕃	雲貴總督	共四人
	黃槐森	雲南巡撫	
	魏光燾	頭品頂戴陝西巡撫	
	譚繼洵	頭品頂戴湖北巡撫	
光緒二十四年	裕祿等	--	共九人
	連順	--	
	國俊	--	
	永德	--	
	豐紳	--	
	濟祿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祥亨	--	
	裕祿	--	
	長庚等	--	
光緒二十五年	陶模	頭品頂戴陝甘總督	共三人
	饒應祺	甘肅新疆巡撫	
	魏光燾	頭品頂戴陝西巡撫	
光緒二十七年	袁世凱	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共九人 袁世凱二幅
	周馥	直隸布政使	
	聶緝槩	江蘇巡撫	
	劉坤一	--	
	王之春	安徽巡撫	
	李興銳	江西巡撫	
	俞廉三	湖南巡撫	
	景星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	
	袁世凱	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宋慶等	四川總督	
光緒二十八年	袁世凱	北洋大臣直省總督	共六人
	張人駿	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	
	馬玉崑	直隸提督	
	袁世凱	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周馥	山東巡撫	
	宗室崇善	--	
光緒二十九年	宗室崇善	--	共二十六人
	錫良	--	
	周馥	兵部尚書銜山東巡撫	趙爾巽二幅、 陳夔龍二幅、 俞廉三二幅
	趙爾巽	湖南巡撫護理山西巡撫	
	趙爾巽	湖南巡撫護理山西巡撫	
	陳夔龍	漕運總督	
	陳夔龍	漕運總督	
	升允	陝西巡撫	
	許應騤	閩浙總督	
	恩壽	江蘇巡撫	
	王之春	廣西巡撫	
	長順	--	
	俞廉三	湖南巡撫	
	俞廉三	湖南巡撫	
	崇善	--	
	德壽	署理兩廣總督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魏光燾	兩江總督	
	鄧華熙	開缺貴州巡撫	
	連順	--	
	岑春煊	署理四川總督廣東巡撫	
	林紹年	兼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	
	恩壽	頭品頂戴江蘇巡撫	
	魏光燾	頭品頂戴兩江總督	
	鄧華熙	開缺貴州巡撫	
	潘效蘇	甘肅新疆巡撫	
	丁振鐸	署理雲貴總督	
	蘇元春	廣西提督	
	林紹年	雲南巡撫	
光緒三十年	誠勳	安徽巡撫	共二十二人 次
	恩壽	江蘇巡撫	
	崇善	--	
	李興銳	署理閩浙總督江西巡撫	趙爾巽、柯逢 時、岑春煊、 林紹年、宗室 崇善、袁世凱 以上各二幅
	夏崑	署理江西巡撫陝西布政使	
	趙爾巽	湖南巡撫	
	趙爾巽	湖南巡撫	
	連順	--	
	錫良	調署四川總督閩浙總督	
	柯逢時	廣西巡撫	
	柯逢時	廣西巡撫	
	岑春煊	兵部尚書銜署理兩廣總督	
	岑春煊	兵部尚書署兩廣總督	
	崧蕃	陝甘總督	
	張人駿	廣東巡撫	
	李興銳	署理閩浙總督江西巡撫	
	林紹年	雲南巡撫	
	潘效蘇	甘肅新疆巡撫	
	林紹年	雲南巡撫	
	馬亮	--	
	宗室崇善	--	
	宗室崇善	--	
	袁世凱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袁世凱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光緒三十一年	馬亮	--	共六人
	宗室崇善	--	

具奏日期	具奏人	具奏人官銜	備註
	宗室崇善	--	
	夏峇	頭品頂戴陝西巡撫	
	陳夔龍	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	
	袁世凱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光緒三十二年	陳夔龍	江蘇巡撫	共二人
	陳夔龍	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	
光緒三十三年	陳夔龍	江蘇巡撫	共一人
光緒三十四年	陳夔龍	調補湖廣總督	共六人
	陳啟泰	江蘇巡撫	
	恩壽	頭品頂戴陸軍部尚書銜兼署西安將軍陝西巡撫	
	徐世昌	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	
	程德全	副都統銜暫署黑龍江巡撫記名副都統	
	程德全	副都統銜暫署黑龍江巡撫記名副都統	
宣統元年	姜桂題	總統武衛左軍直隸提督	共一人
宣統二年	三多	--	共二人
	趙爾豐	督辦川滇邊務大臣	

資料來源：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奏摺》原件統計。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9-1991。
-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43編，臺北：新興書局，1986。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
- (清)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清)翁同龢著，趙中孚編，《翁同龢日記排印本附索引》，收入《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研究資料叢書》，臺北：中文研究資料中心，1970。
- (清)清世宗述，劉承幹校，《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6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 (清)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冊10，收入《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8-1989。
- (清)劉坤一，《劉坤一遺集》，收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上海：中華書局，1959。
-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複製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未記年。
-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
- 《軍機處檔光緒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軍機處檔同治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複製本），輯9，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4。
-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複製本），輯12，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4。
-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複製本），輯25，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5。
-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複製本），輯32，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未記年。
-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複製本），輯12，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
- 《清史列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4。

近代論著

- 王開璽，〈辛酉政變與正統皇權思想——慈禧政變成功原因再探討〉，《清史研究》，2002年4期，頁49-56。
- 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 宋曉希，〈御書賞賜的文治氣象——宋太宗與唐宋御書政治文化的傳承與轉型〉，《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12期，頁13-21。
- 李湜，《明清閨閣繪畫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2。
- 杜恆偉，〈競誇天下無雙絕，獨立人間第一香：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賞析〉，《收藏家》，2016年3期，頁51-57。
- 東方出版社編輯小組，《新編東方國語辭典》，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
- 侯皓之，〈清諸帝賜御書福字及其活動〉，《史學彙刊》，2010年6期，頁105-160。
- 張臨生，〈孔德成先生與故宮〉，《故宮文物月刊》，363期，2013年6月，頁61-62。
- 莊吉發，〈白山黑水——滿洲三仙女神話的歷史考察〉，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冊2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頁237-248。
- 莊吉發，〈翠華南幸·揚州寫真——盛清君臣眼中的揚州〉，收入馮明珠主編，《盛清社會與揚州研究——恭賀陳捷先教授八秩華誕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頁190-225。
- 陳佳，〈清代朝廷書法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 陳捷先，《慈禧寫真》，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
- 劉言，〈“祥瑞”與明代政治〉，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 劉曉晨，〈聽政之暇丹青癖——沈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藝術品》，2016年7期，頁10-23。
- 黎東方，《細說清朝》，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
- 嚴瑞源，《慈禧太后——生活藝術（Empress Dowager Cixi: Her Art of Living）》，香港：海光印刷有限公司，1996。
- Carl, Katharine Augusta. *With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London: KPI Ltd., c1986.
- Ebrey, Patricia Buckl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edited by Patricia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232-25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ay, Jonathan.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Hung Wu and Katherine R. Tsiang, 311-3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urray, Julia K.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in *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18 (1986): 41-59.

圖版出處

- 圖 1 清，〈慈禧太后坐像〉，Collection of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圖 2 清，慈禧太后，〈御筆龍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10。
- 圖 3 清，慈禧太后，〈御筆虎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10。
- 圖 4 清，慈禧太后，〈御筆福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10。
- 圖 5 清，慈禧太后，〈御筆壽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10。
- 圖 6 清，慈禧太后，〈御筆喜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10。
- 圖 7 清，慈禧太后，〈御筆福祿壽字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嚴瑞源編，《慈禧太后——生活藝術 (Empress Dowager Cixi - Her Art of Living)》，香港：海光印刷有限公司，1996，頁 92。
- 圖 8 清，Katharine Augusta Carl，〈慈禧太后書寫大字實景素描〉。圖版取自 Carl, Katharine Augusta,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London: KPI Ltd., c1986, 136.
- 圖 9 清，慈禧太后，〈御筆行書福字片〉，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杜恆偉，〈競誇天下無雙絕，獨立人間第一香：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賞析〉，《收藏家》，2016 年 3 期，頁 51-57，圖 11。
- 圖 10 清，慈禧太后，〈御筆行書福字片〉（局部），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杜恆偉，〈競誇天下無雙絕，獨立人間第一香：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慈禧書畫作品賞析〉，《收藏家》，2016 年 3 期，頁 51-57，圖 11。
- 圖 11 清，慈禧太后，〈牡丹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李湜，《明清閨閣繪畫研究》，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2014，頁 186，圖 98。
- 圖 12 清，雍正七年，〈臺灣總兵王郡奏為恭謝天恩事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3 清，同治元年，〈江南蘇松鎮總兵李起高奏為補授今職謝恩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4 清，同治元年，〈直隸總督文煜奏為查明通州學政汪元方居官考試循例密奏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5 清，咸豐十一年，〈改祺祥為同治年號懿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向斯，《慈禧私家相簿》，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 158。
- 圖 16 清，〈慈禧太后在頤和園樂壽堂與外國公使夫人合影〉，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劉北汜、徐啟憲，《故宮珍藏人物照片薈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 40。

圖 17 清，慈禧太后，〈蟠桃圖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清，光緒二十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謝恩賞物品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清，光緒二十年，〈貴州總兵和耀曾奏謝恩賞福字等件（上皇太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 清，光緒二十二年，〈陝甘總督新疆巡撫陶模奏為恭謝天恩上臣福字一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Lord” with Ministers of the Same Mi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Bestowing “Imperial” Calligraphy

Chen, Yuh-shiow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Empress Dowager Cixi wielded power in the Qing dynasty over a span of 48 years under the Tongzhi and Guangxu emperors, a period leaving behind numerous records of her writing large characters and her calligraphic works. Cixi’s practice of calligraphy was one of the political means she used to succeed in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enterprise. Her “imperial” calligraphy was given as New Year presents and as birthday gifts to prominent officials. She was, in fact, following in the long tradition of previous rulers over the centuries in employing the art of writing for political gain. The act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bestowing large-character calligraphy to officials and ministers thus had ulterior motives in terms of her subjects.

After receiving bestowals, Cixi’s ministers and officials would reply with memorials of gratitude in which they expressed loyalty to her. It was a reminder for them to think along the same lines when it came to their work involving matters of the country, in effect spurring them to follow through with court or local matters within their purview. The recipients of Cixi’s large-character calligraphic works saw them as auspicious omens from the heavens, portents for overcoming obstacles, and sign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the country. Empress Dowager Cixi’s “imperial” large-character calligraphy was therefore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is “lord” and her officials, serving as a testimonial to her political tactics.

Keywords: Empress Dowager Cixi, imperial calligraphy, bestowing “fortune” characters, auspicious omens, being of the same mind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1 清 慈禧太后坐像 Collection of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圖2 清 慈禧太后 御筆龍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慈禧太后 御筆虎
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慈禧太后 御筆福
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清 慈禧太后 御筆壽
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6 清 慈禧太后 御筆喜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清 慈禧太后 御筆福壽字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清 Katharine Augusta Carl 慈禧太后書寫大字實景素描



圖 9 清 慈禧太后 御筆行書福字片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清 慈禧太后 御筆
行書福字片 局部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清 慈禧太后 牡丹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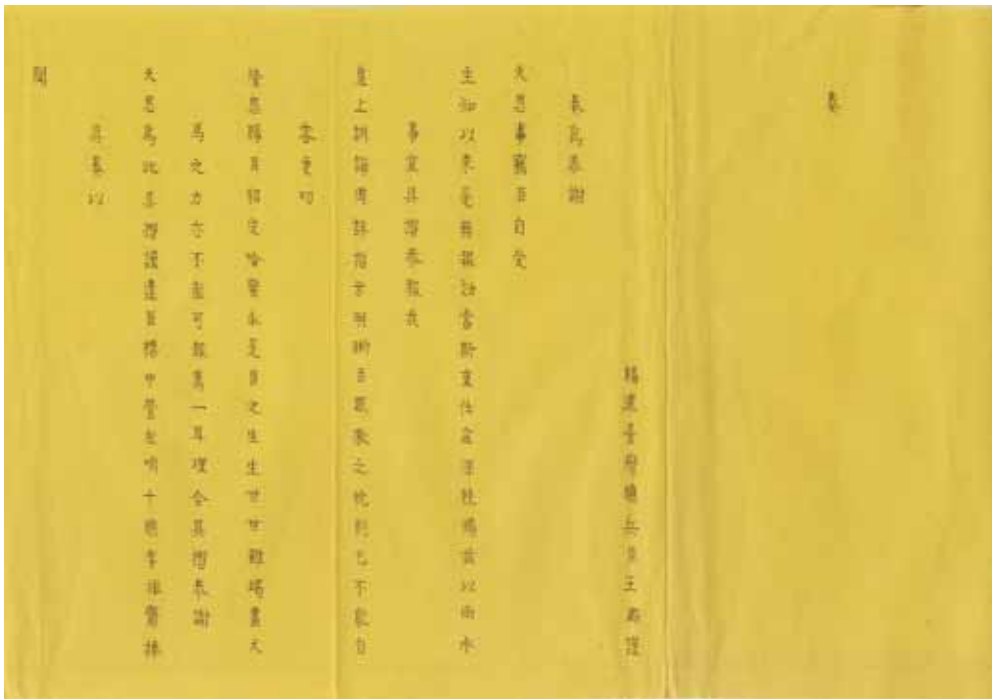


圖 12 清 雍正七年 臺灣總兵王郡奏為恭謝天恩事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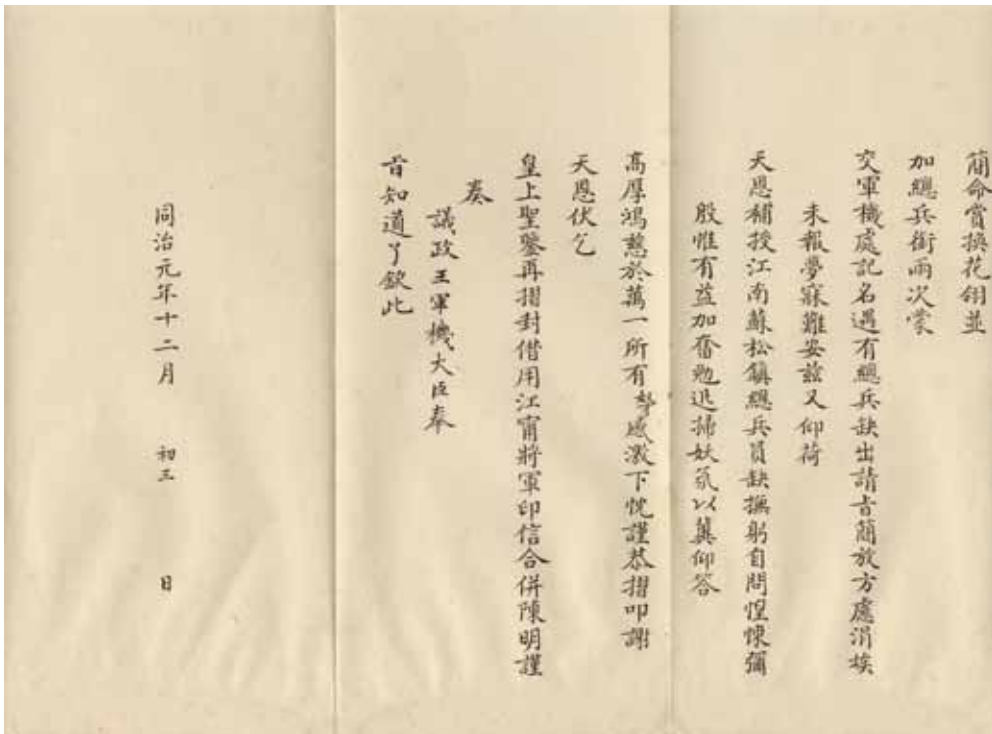


圖 13 清 同治元年 江南蘇松鎮總兵李起高奏為補授今職謝恩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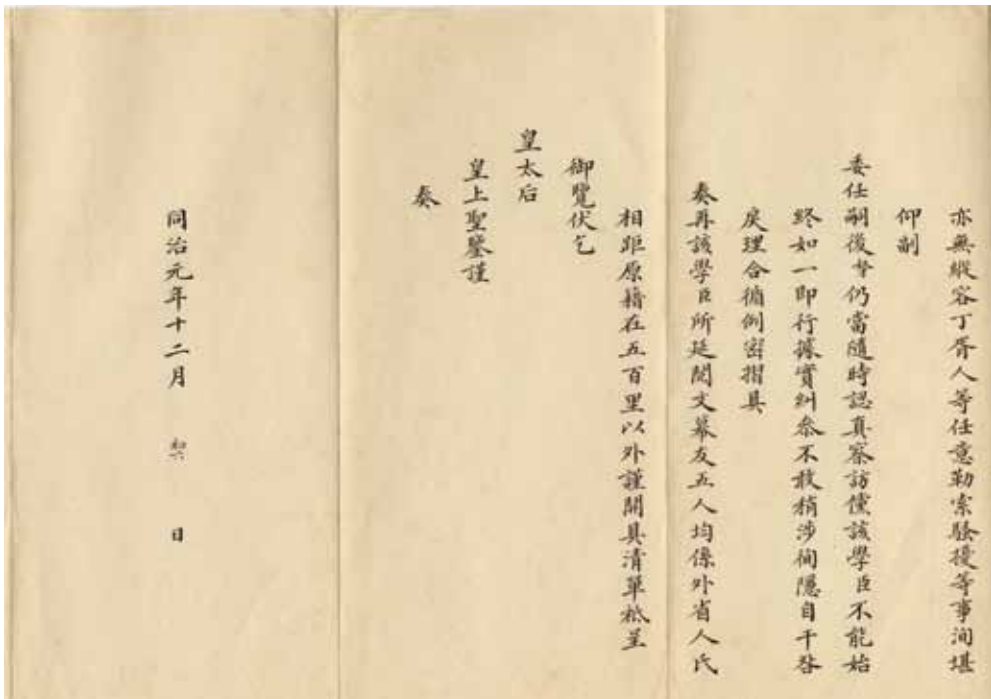


圖 14 清 同治元年 直隸總督文煜奏為查明通州學政汪元方居官考試循例密奏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清 咸豐十一年 改祺祥為同治年號懿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清 慈禧太后在頤和園樂壽堂與外國公使夫人合影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清 慈禧太后 蟠桃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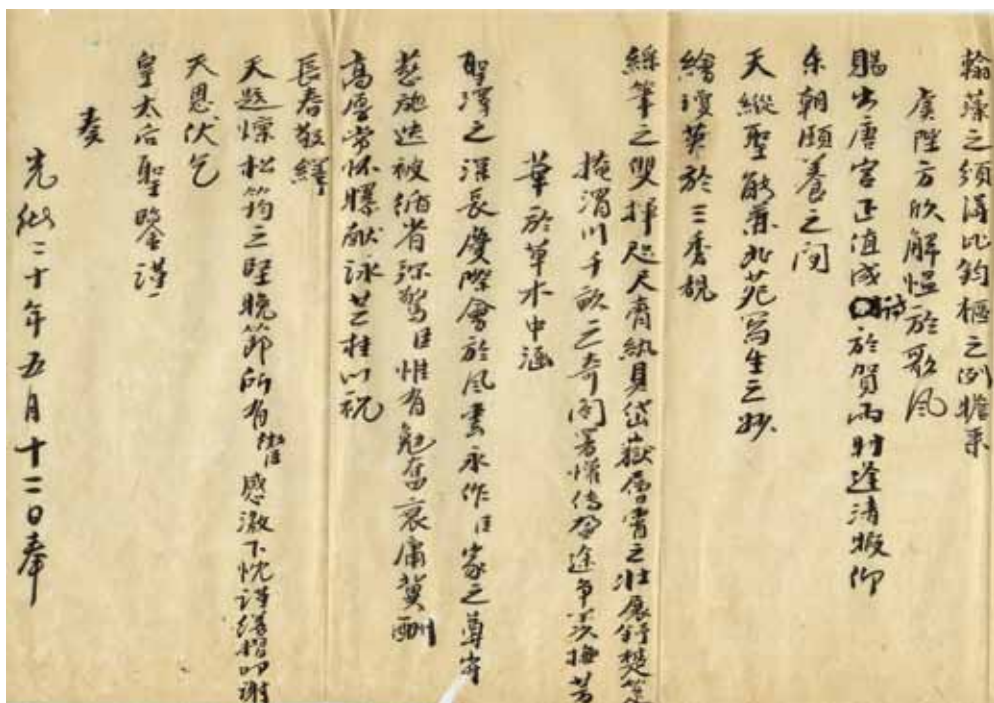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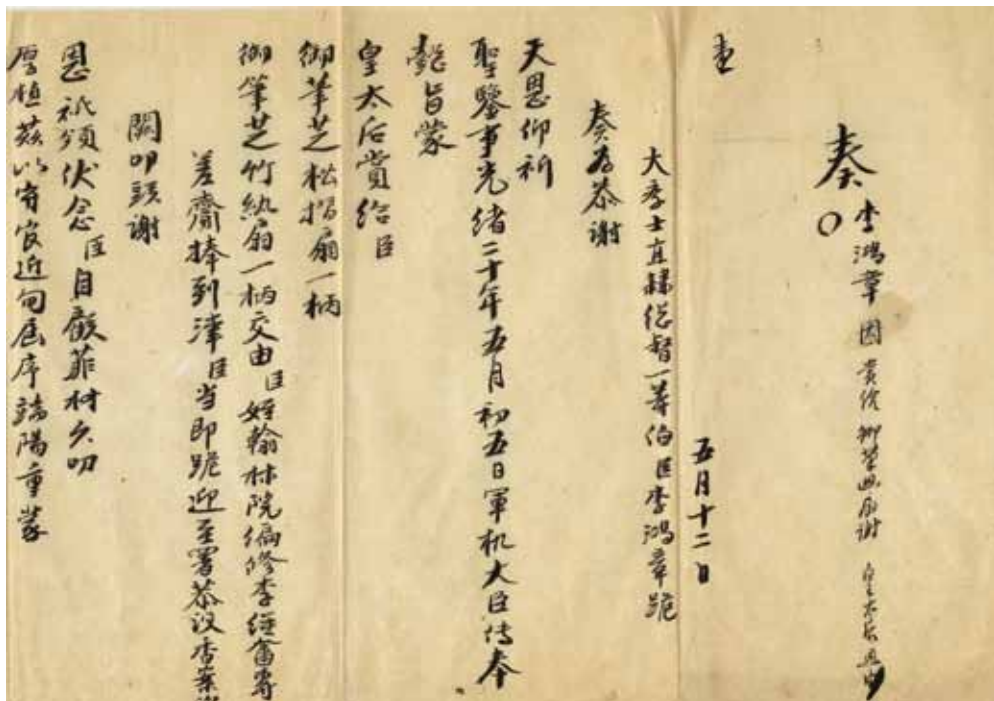


圖 18 清 光緒二十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謝恩賞物品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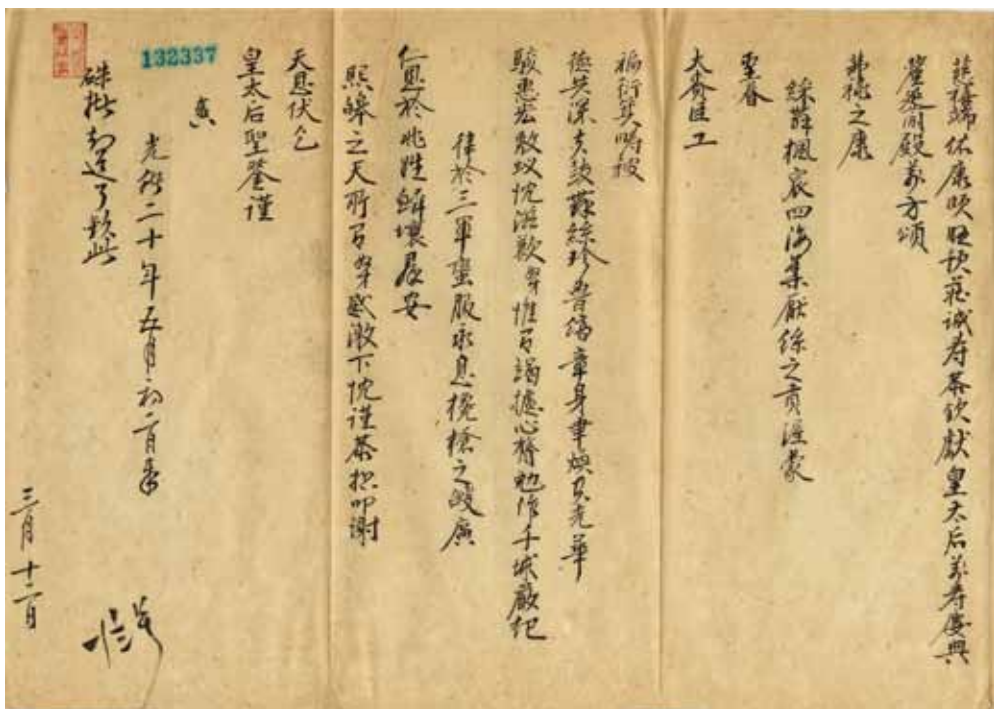


圖 19 清 光緒二十年 貴州總兵和耀曾奏謝恩賞福字等件 上皇太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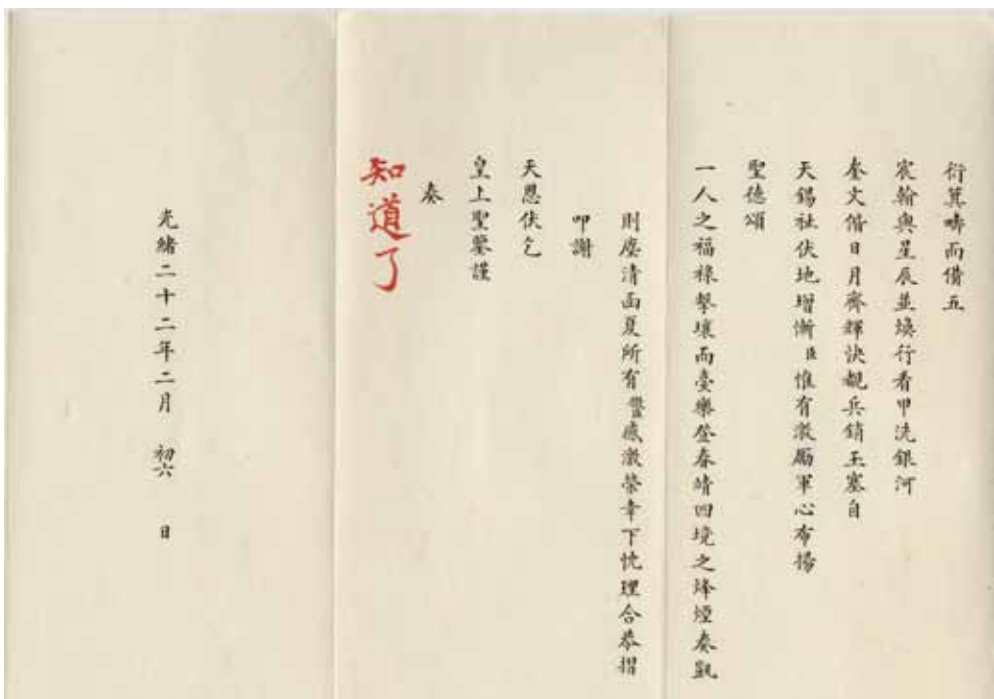


圖 20 清 光緒二十二年 陝甘總督新疆巡撫陶模奏為恭謝天恩上臣福字一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